

口述

元好问在聊城送穷

□ 祝伟康

公元1233年，岁在癸巳，这一年四月，蒙古大军攻入金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时任金国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的元好问，与大批金国官员一同被俘，被押解至聊城羁管。两年后，又移居冠氏（今冠县），在那里度过了四年。元好问在聊城的六年时间里，留下了大量诗文。

清代李光廷《广元遗山年谱》推断，有一首七绝《送穷》，就是元好问到聊城第一年所作：“送君君去欲何之，暂去还来也不辞。但愧苦无相赠物，柳船轻似去年时。”这时的元好问刚经历破国之痛，人又在羁管之中，所以诗中满是无奈。

送穷，是古代长期流传的习俗。相传颛顼帝的儿子，喜欢穿破衣服，吃稀粥，所以人们叫他“穷子”。穷子死在了正月最后一天，人们就在这一天做稀粥，扔旧衣服，称之为“送穷鬼”。

按古代历法，每月月初称朔、月中为望、月末曰晦。所以，正月的最后一天，就是正月晦日。南朝萧梁时，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（正月）晦日送

穷。”到唐代，送穷是颇为盛行的民俗。韩愈曾作《送穷文》，写的就是在晦日送穷；姚合《晦日送穷》说得更明白：“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送穷。”

在元好问生活的时代，送穷也是广为流行的民俗。在现存的元好问诗词中，有三首七绝《送穷》，还有一首“沁园春”词也和送穷有关。其中最早的一首七绝《送穷》：“主人不倦星奴倦，辛苦年年缚草船。”星奴的典故，就出自韩愈的《送穷文》：“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，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，缚草为船。”元好问说“年年缚草船”，可见送穷是每年都要举行的。

由唐至清，正月晦日送穷的说法一直是主流。那么，元好问在聊城送穷，一定是正月晦日吗？还真不是。

可能是癸巳年除夕。元好问《沁园春·除夕二首》其二，开篇就是“再见新正，去岁逐贫，今年送穷”。标题是“除夕”，词中更是明确说“逐贫”“送穷”。宋金之际，有很多关于除夕送穷的记载。北宋王令《送穷文》：“维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，谨奉香、酒，送穷鬼而告之曰……”南宋区士衡《送穷

文》：“戊午之冬，岁除之夕，区子束苇为舟，剡木为楫，具糗糒薪台器皿，揖穷鬼于庭而遣之。”这种风俗，到元、明仍有流传。宋末元初诗人黄庚《除夕》：“且斟分岁酒，懒赋送穷文。”元代诗人张雨《除夕》：“自缘身懒惰，莫遣送穷车。”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，范景文《乙卯除夕》其一：“无文难送穷中鬼，人俗羞称吏是仙。”范景文是河北吴桥人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任东昌府推官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是在东昌府任上。综上可知，宋金以降，确实有除夕送穷或者除夕撰写送穷文辞的习俗。

可能是正月初七。南宋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引用《岁时杂记》：“人日（正月初七）前一日扫聚粪帚，人未行时，以煎饼七枚覆其上，弃之通衢，以送穷。”两宋之间的金盈之《醉翁谈录》记载也是如此。元好问的另一首七绝《送穷》：“煎饼虚抛撒堆，满城都道送穷回。”撒堆，是当时的土话，清代梁同书《直语补正》认为“言秽杂不净也”，就是垃圾堆的意思。垃圾堆上虚抛煎饼，和宋人记载的“以煎饼七枚覆

其上”一模一样。由此推测，元好问在聊城送穷，也有可能是甲午年正月初七。

也可能是腊月二十五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四十九，五律《门外野望》就说：“僧叹家禳疫，神船社送穷。”作者自注是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可见当时还有在腊月二十五送穷的习俗。

还可能是正月初一。还是陆游的《剑南诗稿》，五律《新岁》：“载糗送穷鬼，扶箕迎紫姑。”

元好问在聊城送穷的时间，以正月晦日的概率最大，除夕、人日、腊月二十五、正月初一也有相应的佐证。但总体说来，不可能是如今流行的正月初五。正月初五，又称“破五”，也有逐穷迎财的意义，但在金元之际的聊城尚未形成风俗，起码尚未见到有明确的佐证。

虽然元好问具体哪一天送穷，颇难考据，但一定是癸巳年末、甲午年初，也就是蛇年将尽、马年新春之际，和今年属相恰合。遥想八百年前的元好问在聊城过新年，送穷神，感叹民俗演变、源远流长，还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

童年“杨巴狗”

□ 刘书林

今儿聊聊我小时候吃杨花穗，也就是老家说的“杨巴狗”的稀罕事儿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能吃么？但在我小时候，那可是孩子们最盼的食物。

老话说“九尽杨花开”。啥叫“九尽”呢？就是数九寒天熬到头了。从冬至那天起，人们就掰着手指头数：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……一直数到九九，整整八十一天，那刺骨的“数九寒冬”才算真正过去。等暖风一吹，天地间就软和下来，村里的柳树杨树，仿佛一夜之间就“醒”了，枝丫上先冒出一层朦朦胧胧的嫩黄、浅绿，那是新叶子要长出来的模样。紧接着，那些鼓鼓囊囊的杨花穗，就悄悄绽开了，吐出毛茸茸的杨花。远远望去，一树树的“大穗头”缀在泛绿的枝条上，

热热闹闹的，就像给村庄罩上了一层带着流苏的锦缎，好看极了。

一见到这景象，我的眼眶和心口就同时一热，魂儿仿佛被那毛茸茸的穗子勾着，倏地一下拽回了20世纪60年代。当年人们日子过得清苦，手里没啥闲钱，“零食”这俩字，我小时候都没听过。可咱有办法找“好吃的”，老宅北院那堵斑驳的土墙根外，并排长着三棵杨树，树干粗得我伸开胳膊都抱不过来——那树上，藏着我们童年最解馋的“零嘴儿”。

整个早春，我们的心思就全拴在这三棵树上。惊蛰一过，春分要到，杨树叶芽刚冒头，一串串杨花穗就悄无声息地垂下来了。它们长得像谷穗，只是一头尖、一头略圆，带着一层淡淡的白霜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都是青绿色的，就像缩小版的橄榄；慢慢地，那些长在向阳处的“杨巴狗”，尖梢就会泛起一抹淡淡的紫红，那就是熟了信号。我们这群“馋猴儿”，就天天在杨树下打转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树梢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

爬树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，村里的泽玉和泽善，那是爬树的好手。我至今记得有一次，泽玉往手心里“呸呸”啐了两口，脱下那双露着脚趾的布鞋，往地上一甩，光着黑乎乎脚丫，像只灵活的狸猫，噌噌噌就往树上爬。粗糙的树皮磨得掌心发红，他却满不在乎，还咧着嘴冲我们笑。他攀上一根横杈，伸手便够到一穗紫得发亮、看上去就甜滋滋的“杨巴狗”，揪下来一把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嚼起来。我们在树下急得直跺脚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泽玉，啥味儿啊？好吃不？”他只顾低

头吃，全然不顾树下眼巴巴的我们。我们更急了，一个劲地催他扔一些下来。

他往下扔时，我眼疾手快一把接住，忙不迭咬了一大口——初尝是一股子青涩的草木气，嚼着嚼着，舌尖上竟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甜，轻得几乎捉不住，却“嗡”的一下直钻后脑勺——那个滋味，现在想来，比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还过瘾。

不过我胆子小，很少爬树，大多时候就守在树下当“地面部队”，捡那些被树上伙伴遗落或扔下来的“杨巴狗”。有的杨花穗熟透了，微微泛着红，摸上去软软的，轻轻一捏就会留下浅浅的指印；有的掉在地上，沾了点泥土，却依然挡不住那股淡淡的清香—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哪怕是一颗落果，我们也当宝贝似的捡起来。不过，我们也有不劳而获的“丰收期”。就是经过一夜风雨之后，杨树下满地都是熟透了自己掉下来的、或被鸟雀啄了一半的杨花穗，散落在泥地上、草丛里。我把衣兜装得满满当当，还嫌不够，就脱下身上那件带补丁的褂子，摊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把杨花穗拢起来，打成一个小包袱，像打了胜仗似的，捧着回家。

到家之后，母亲就成了这场“杨花穗盛宴”最后的“导演”。她会把我捡回来的“战利品”倒在簸箕里，仔仔细细地挑一遍，把坏的、烂的都挑出去。然后拿起剪刀，咔嚓咔嚓地把杨花穗那细长、发苦的柄剪掉。接着烧上一锅清水，把杨花穗洗得干干净净、水水灵灵。最让我期待的时刻，就是看着母亲把洗干净的杨花穗倒进那口黝黑

的大铁锅里，倒上井水，盖上木锅盖。灶膛里，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着，像在唱一首歌，我就蹲在灶旁边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锅盖，盼着香味快点飘出来。

没过多久，一丝丝清冽的甜香，混着热腾腾的白气，从锅盖缝里使劲钻出来，慢慢弥漫了整个灶房。那香味里，还带着杨树的草木气，闻一口，就让人口水直流。不用等太久，锅里的杨花穗就变得软软糯糯的，颜色也变得更深了。母亲把杨花穗捞出来，沥干水分，放在案板上细细切碎，盛进粗瓷大碗里，再撒上一小撮珍贵的盐粒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就这一小撮盐，一下子就把杨花穗里隐藏的甜味给点醒了，那味道变得更扎实、更暖心，吃一口，浑身舒服。

我捧着粗瓷大碗，在灶台边吃得专心致志，连一点汤汁都舍不得浪费。在那个缺油少盐、没啥作料的年代，一碗盐拌杨花穗，就是最好吃的美味了。母亲见我吃得香甜，眼里满是温柔的笑意。那慈爱的眼神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如今没人再吃杨花穗了，因为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好吃的，味道发涩还多渣。可在我心里，在我记忆的味蕾上，它永远是最好吃的东西。那爬树时掌心火辣辣地疼，那弯腰捡“宝贝”时的欢喜，那等锅里飘出香味时的急切，还有那碗盐拌杨花穗下肚后，从胃里暖遍全身的熨帖……所有这些，都一丝一缕地，和那个清贫却鲜活的年代、和那三棵沉默的杨树、和母亲在灶房里劳作的背影，紧紧缠在了一起，酿成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、再也复制不了的，最深沉、最醇厚的童年味道。

